

# 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收藏史话

陈红彦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明解缙等奉敕编纂。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又字缙绅，吉水（今属江西）人。洪武进士，居官累迁再谪，终死于狱，追谥文毅。著有《宋书》、《文毅集》、《春雨杂述》等。总裁《太祖实录》，永乐二年（1404）曾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成祖朱棣以古今事物散于众书，不易检阅，欲将经史子集诸家之书，析类辑为一编，而以韵统之，便于考索。于是，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命解缙主其事，一百四十七人参与编纂，于次年十二月完成。帝嫌其未备，又增派姚广孝、刘季篪等人同主其事，配副总裁若干人，参与编校、誊写者三千余人，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赐今名。

此书收存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正文 22877 卷，凡例和目录 60 卷，装成 11095 册。总字数约在 3.7 亿字左右。书以单字为目，以《洪武正韵》系字，每字下先注音、文，次录各韵书、字书所注反切、释义，再列该字楷、篆、隶、草各体，最后分类辑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搜集颇多。清人从中辑出佚书数百种，收入《四库》仅 388 种，4926 卷，列入“存目”者又百余部。

《大典》原书仅抄一份，迁都北京后，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为防大典被毁，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照原本重录。重录本于隆庆元年（1567）告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正本原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

在明朝，《大典》深藏内府，民间不得窥视，一般官僚也无缘寓目，因此，有关《大典》的猜测也很多。明亡之后，永乐正本不知下落，可能在明末毁于兵火。嘉靖重录本在清初也不知下落，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家档案

库皇史宬发现了重录本，已佚不少。雍正年间，《大典》重录本又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由于当时管理不善，《大典》又有丢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位于东交民巷的翰林院，靠近使馆区，已沦为战场。对《大典》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敬一亭被毁，《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人翻检拾走。以后，外国侵略者还从一些书商、收藏家手中收购《大典》。最后，翰林院仅剩的六十四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

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度藏，但未及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大典》。《永乐大典》是汉文古籍中最珍贵的类书，孤本秘籍，佚而仅存，弥足珍贵。《大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书中辑录的许多珍贵的书籍已经失传，多赖此书才能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在此之后，《永乐大典》聚散离合的过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

处负责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北图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这60册中有35册属当年北图最早入藏的60册，而最初入藏的60册中的另外25册，当年也曾运到过上海，但没有运美，而是后来运回了北平。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北图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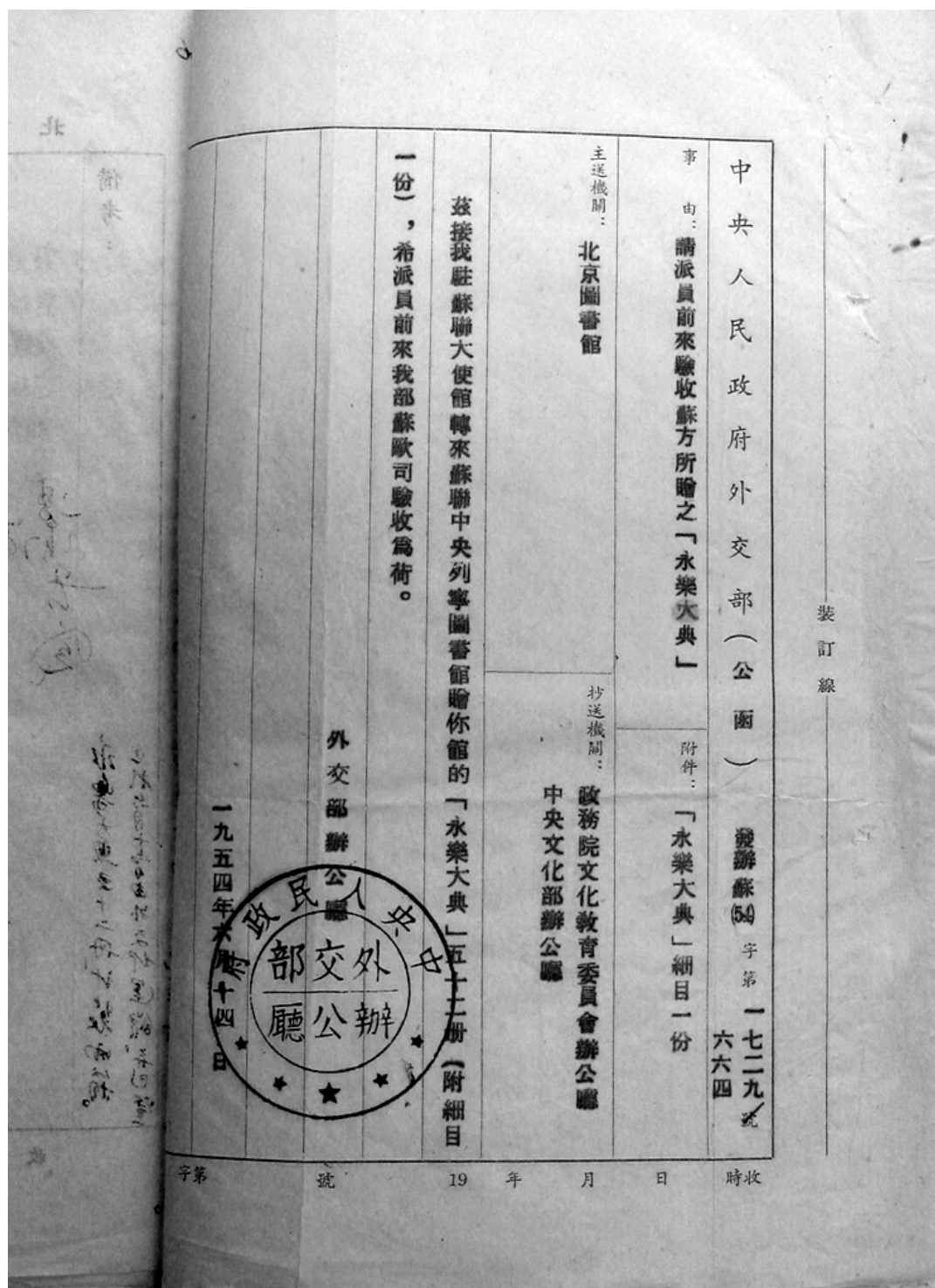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图收藏。并借此机会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之，

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

移送 3 册。向北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芾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蕩如先生，各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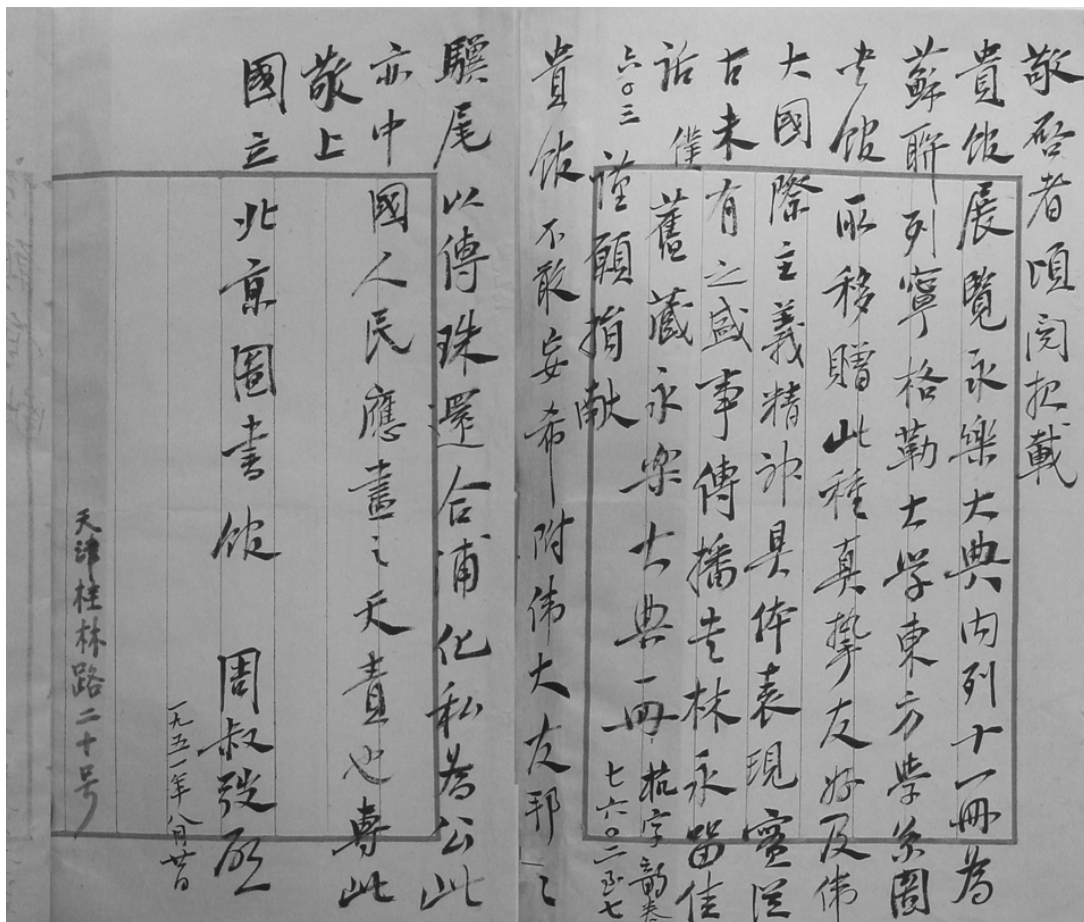


### 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捐赠档案

此外，在中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感动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我国 3 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 52 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 1 册。

这样 67 册远离故国的《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北图“团聚”了。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五、六十年代，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 4 册《永乐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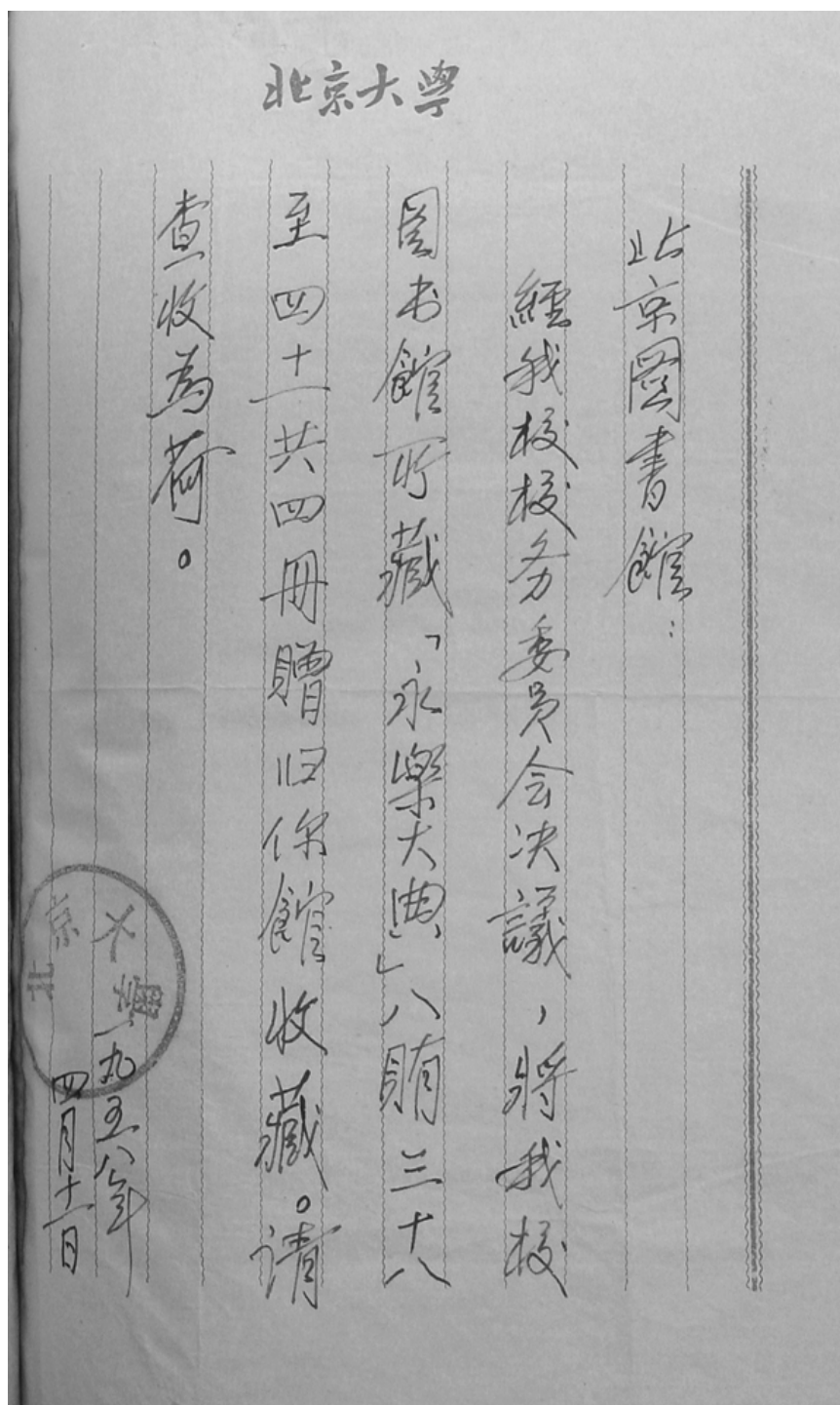


周叔弢先生捐赠信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 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被剪下来做了鞋样，家中的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的内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北图，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目前，《大典》残本散落在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大约 380 册左右。

而迄今为止，通过政府拨交、国内外赠送、本馆采访等多种渠道，我馆已有《大典》221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居各处收藏的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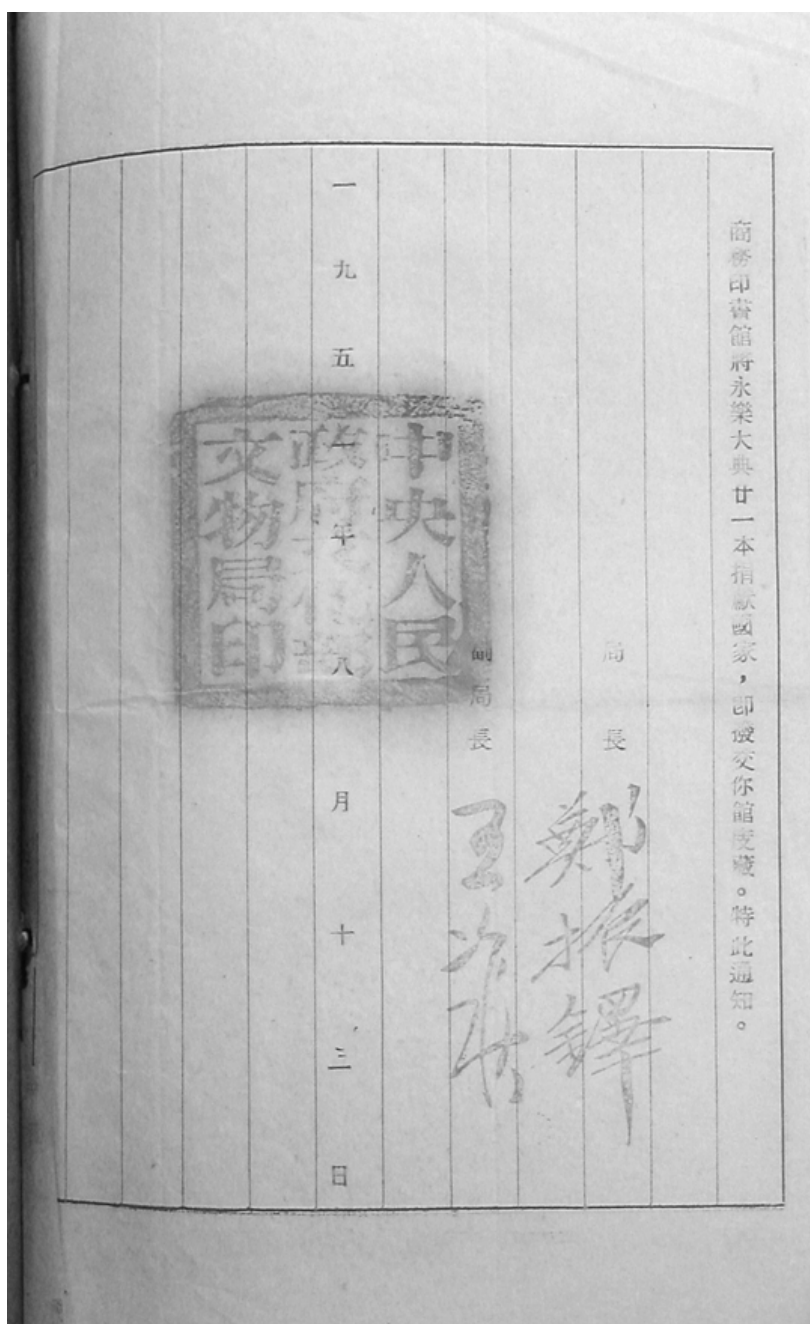


### 北京大学捐赠信

《永乐大典》在解放前曾影印过两次。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已收集到的《大典》影印出版。使当年深藏宫中的这部孤本秘籍的劫后之余重见天日，也算是中

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喜事。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即原北图）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际友人的友好赠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在此也向为文物保护作出过贡献的人们表示最真挚、最崇高的敬意。



涵芬楼捐赠档案